

续
编

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



(辽)新登字第9号

二十世纪中国两岸文学史(续编)

主编 徐国纶 王春荣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沈阳市崇山中路66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分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0.625 字数:500千

1993年12月第1版 199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责任编辑:蒋秀英 封面设计:刘桂湘
责任校对:沈 飞

ISBN 7-5610-2767-2

I·293 定价:18.00元

绪 论

四十年来，中国两岸文学经过了复杂而曲折的发展历程。两岸文学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由中国大陆文学和台湾进步文学共同组成的统一的历史整体。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支脉。中国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也有挫折和失误的历史教训。总结历史发展的正反面经验，探讨文学创作的成就和规律，对促进两岸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文学形成的历史条件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的现代文学史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为当代文学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条件。

中国现代文学也为当代文学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正反面经验。从“五四”文学革命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至抗战时期文学的发展，经历了错综复杂的斗争。它不仅积累了文学思潮斗争的经验教训，而且形成了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现代文学更为当代文学的建立准备了一支坚强的文艺队伍。这支队伍的形成和变化是同中国革命特殊的历史条件分不开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逐渐分成两支文艺队伍。一支是在国统区坚持革命文艺活动的作家队伍；一支是在革命根据地锻炼或成长起来的作家队伍；这两支队伍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大会师，为当代文学的建立准备了骨干力量。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当中许多人成了各个文艺部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为当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广阔的现实基础。新中国成立，建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中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谱写了光彩熠熠的英雄乐章。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的战斗传统和丰富经验，一旦同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和新的时代结合起来，便产生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学。这种新型的文学如同烂漫的山花，开放在中国这块古老而又新生的土地上，虽几经风雨，它却更加茁壮地成长起来。台湾省的当代文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和发展。

二、当代文学的性质和特征

中国两岸文学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下的文学，各有不同的性质和特征，却又是统一的历史整体。从主流上看，中国大陆文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文学，即社会主义文学。台湾文学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貌。它有表现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进步倾向的文学，也还有资产阶级的腐朽文学。

一般地说，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的性质决定着文学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进入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期。1956年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随着革命性质和经济基础的根本性变化，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也必然发生深刻的本质的变化。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的性质决定了中国大陆文学的性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文学。绝大多数作家坚持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台湾文学是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蒋介石集团败退到台湾省以后，经过几十年的营建，台湾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因此，从整体来说，台湾文学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文学。但成分也不是单一的。多数的作家是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一批具有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优秀作品。即使是现代派作家创作的一些作品，也具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意义。正是这些进步文学构成了中国当代两岸文学史的主导内容。应当积极地发展两岸文学的双向交

流，互相砥砺，采长补短，共同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做出贡献。

四十年来，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文学在发展道路上，尽管遭受过“左”倾思潮的干扰以及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仍日趋繁荣，成就卓著，形成自己的鲜明特征。

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革命倾向性。这是社会主义文学和资本主义文学最根本的区别。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文艺路线指引下，大批作家在深入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过程中，思想感情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逐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他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描写着革命历史和现实生活复杂的矛盾斗争，创作出一批各种体裁样式的名篇佳作。这些作品都热情地讴歌了在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崇高美德，同时也无情地揭露剥削阶级的丑恶灵魂及其反动本质，充分表现了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革命倾向性。

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这是社会主义文学重要特征之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已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描写对象和歌颂对象。是“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的显著变化。现代文学作品所创造的人物形象多是受压迫与反抗压迫的工农大众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当代文学画廊中涌现出一批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周大勇、朱老忠、梁生宝、林道静、江雪琴、乔光朴、陆文婷、梁三喜、郑子云等，就是他们的优秀代表。

革命现实主义已成为作家的主要创作方法。这也是社会主义文学重要标志之一。革命现实主义继承了“五四”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时代有了新的广泛发展，并注意吸收其他创作方法的优点，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它被绝大多数的作家所掌握，并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文学的主导思潮。创作实践表明，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作品，从生活出发，真实地、发展地反映现实生活，把现实和

理想结合起来，给人以强烈的信心和力量。

社会主义文学还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的特点。当代文学是在继承和弘扬我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民族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国有用的文学观念、文学形式和手法，同新的时代和新的描写对象结合起来，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许多作家在民族化的道路上作了新的开拓和探索，取得了很大成就，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

三、当代文学史的分期与各时期的文学思潮

中国当代文学史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文学发展史。文学艺术是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的发展过程必然受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制约和影响。当然，文学的发展也有它自身的规律，但它同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阶段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中国当代文学史可大体分为三个时期：

（一）形成与发展时期

从1949年10月到1966年4月，是社会主义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进入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建国前夕，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周恩来提出：“我们主张文艺为工农兵服务”^①。这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953年9月，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恩来又提出：“文艺就必须首先歌颂工农兵中间的先进人物”，“今天文艺创作的重点，应该放在歌颂的方面，应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②。周扬在会上号召作家要学习和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创造新英雄人物。这些文学主张和观点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热烈响应，成为文坛上占主导地位的文学思潮。这种文学思潮表现在创作上形成一股相对稳定、历时较长的“放歌文学”的创作潮流。建国初期，涌现一批歌颂共产党、歌颂工农兵、歌颂革命战争的优秀作品，如《风云初记》（孙犁）、《保卫延安》（杜鹏程）、“致青年公民”（郭小川）、《天

① ② 《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

山牧歌》(闻捷)、《龙须沟》(老舍)、《万水千山》(陈其通)、《谁是最可爱的人》(魏巍)等。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许多与时代同步的作家,创作一批热情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工农兵建设业绩的作品。如《三里湾》(赵树理)、《在田野上,前进!》(秦兆阳)、《欢笑的金沙江》(李乔)、《考验》(夏衍)、《放声歌唱》(贺敬之)等。

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文坛出现了新局面。许多作家、评论家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左”倾文学思潮的束缚,探讨一些理论“禁区”的问题。秦兆阳发表了著名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某些质疑,阐发了现实主义真实性和典型化问题。巴人的《论人情》、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对人性、人道主义和文学创作规律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对文学的歌颂和暴露以及题材、风格和表现手法多样化问题也展开了论争。在“双百”方针指引下,文艺界出现了思想解放的思潮,给文学创作带来了多种创作潮流:革命战争文学创作潮流,革命历史,文学创作潮流,“干预生活”创作潮流,“人性、人道主义”创作潮流。这种多种文学创作潮流同时并存的现象,正说明了文学创作在题材、风格和手法上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反映革命战争、革命历史,以及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长篇画卷,竞相问世,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称赞。如《红日》(吴强)、《林海雪原》(曲波)、《创业史》(柳青)、《红旗谱》(梁斌)、《青春之歌》(杨沫)、《红岩》(罗广斌 杨益言)、《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等。这些革命现实主义优秀作品,显示出当代文学创作的新水平,是社会主义文学趋向成熟的标志。“干预生活”的作品有《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草木篇》(流沙河)、《洞箫横吹》(海默)等。反映“人性、人道主义”的作品有《在悬崖上》(邓友梅)、《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电影《早春二月》(谢铁骊)等。

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估计,“左”倾文学思潮愈演愈烈。

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把文艺界一批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错划为“右派”；1958年的文艺“大跃进”，虚假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泛滥；1959年的“反右倾”，把那些勇于探索的文学评论家也戴上了“右倾”的帽子。这些都给文艺界带来了严重后果。

1960年冬，调整了文艺政策，开始纠正“左”倾文学思潮的错误，使文学创作一度出现过“中兴”局面。1961年6月19日，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关于文艺创作的讲话，特别强调艺术民主和尊重文艺规律。这个讲话，一方面纠正“左”倾文学思潮的错误，一方面倡导革命现实主义，繁荣文艺创作。在文艺政策调整的宽松环境下，在关于历史剧的讨论的基础上，出现了“以古鉴今”的创作潮流。《海瑞罢官》（吴晗）、《关汉卿》（田汉）、《林则徐》（叶之）、《蔡文姬》（郭沫若）、《胆剑篇》（曹禺）、《李慧娘》（孟超）、《李自成》（姚雪垠）等优秀剧作和小说陆续问世。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错误地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强调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江青、康生等利用这个错误口号，煽动极左思潮。从1963年到1965年，又在文艺界掀起了政治批判运动。这种批判严重混淆了文艺问题和政治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界限，使“左”倾文学思潮得到了恶性发展。

（二）“文化大革命”时期

1966年5月到1976年9月，是社会主义文学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2月，林彪、江青炮制了《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一个步骤。这个纪要把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文艺运动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黑线”；把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文艺作品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把文艺界的领导和革命作家污蔑为“黑线人物”。“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揪斗文艺部门领导人，解散文艺团体，停止文艺刊物出版，围剿作家作品，大兴文字狱。大批作家惨遭凌辱、迫害，致使社会

主义文艺遭受一场空前浩劫。

这十年的文艺创作情况错综复杂。大体说来有三种文艺：阴谋文艺（反动文艺）、虚假文艺、革命文艺。阴谋文艺是在“四人帮”授意和策划下炮制出来的文艺，为其政治阴谋服务的。如《盛大的节日》、《反击》等。虚假文艺是在“四人帮”唯心主义创作模式影响下，创作的一批歪曲或粉饰现实的文艺，这类作品的数量较多。革命文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如电影《创业》（张天民）、长篇小说手抄本《第二次握手》（张扬）、诗歌《团泊洼的秋天》（郭小川）等。1976年爆发了伟大的“四五”运动，广大群众以诗歌为武器，吹响了反击“四人帮”的战斗号角。这预示着“四人帮”必然覆灭的天安门诗歌运动，为新时期文学迎来了黎明的曙光。

（三）新时期

从1976年10月到80年代末，是社会主义文学新的发展时期。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我国进入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也跨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初始阶段，文学创作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涌现一批较优秀的作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界进一步解放思想，冲破“左”的束缚，从“四人帮”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及建国以来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文艺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79年10月，召开了第四次文代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致了《祝辞》。他科学地评估了建国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提出了我国新时期的文艺纲领，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新形势下，革命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思潮先后登上了文艺舞台，形成文学创作潮流多样化的崭新局面。新时期最先出现的创作潮流是“伤痕文学”。它是作家们面对十年浩劫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灾难与伤痛，对“四人帮”罪行的揭露。如《班主任》（刘心武）、《啊！》（冯骥才）、《将军吟》（莫应丰）、《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等。在“伤痕文学”的基础上出现了“反思文学”的创作

潮流。它是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或建国三十年来的历史的回顾与思考，是“伤痕文学”的扩展和深化。代表作品有《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李顺大造屋》（高晓声）、《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天云山传奇》（鲁彦周）、《人到中年》（谌容）、《芙蓉镇》（古华）、《随想录》（巴金）等。1981年，全国各条战线掀起了改革的热潮，涌现一批献身于改革事业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人物。于是，“改革文学”的创作潮流应运而生。《乔厂长上任记》的问世，为改革文学开了先河，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随之出现了《赤橙黄绿青蓝紫》（蒋子龙）、《沉重的翅膀》（张洁）、《花园街五号》（李国文）、《新星》（柯云路）等一批优秀之作。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作家们艺术视角的拓展，1985年前后，文学创作潮流逐渐呈现出多样交叉的新态势。诸如“现代派”文学、军旅文学、乡土文学、女性文学、寻根文学、文化反思文学、纪实文学、通俗文学各领风骚、独具异彩，相互竞赛，共同发展。

新时期的文艺理论批评战线也很活跃。许多评论家解放思想，勇于开拓，对拨乱反正，繁荣创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西方的文艺思潮纷纷涌入，在文艺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也开始滋生蔓延。早在1979年初，邓小平就代表党中央及时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①但由于文艺领导部门贯彻无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出现泛滥之势。1981年7月，邓小平严正指出了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领导的涣散软弱状态，指出必须批评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文艺界批判了自由化思潮。1985年开始，文艺界又出现了思想混乱状态：宣扬绝对自由，鼓吹文艺要“淡化政治”，否定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强调文艺要只“表现自我”，脱离人民和脱离时代……1986年底，邓

^①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150——151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小平再次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后来，又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四、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主要经验教训

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历史教训。其主要经验教训是：

调整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在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影响着文艺兴衰的原则问题。长期以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但这种提法不够全面、不够科学，而且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往往对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作简单化与庸俗化的理解，束缚文艺生产力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利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这个口号，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服务，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粉碎“四人帮”以后，鉴于过去的历史教训，调整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1980年7月，党中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总方针，为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正确方向。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决不意味着文艺可以脱离政治，事实上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总方针，比孤立地提“文艺为政治服务”全面、科学。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概括了文艺工作的总任务和根本目的。实践证明，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由于正确理解与处理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使文艺事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艺术民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促进文艺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它的基本点是，在艺术上实行自由竞赛，在学术上自由讨论。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正确和先进的东西，纠正错误和落后的东西；用真、善、美克服假、恶、丑，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和

科学事业。贯彻“双百”方针也是艺术民主的体现，它可以充分发挥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和艺术个性；充分发挥文艺批评家的聪明才智，阐明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地实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建国以来，在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上，也经过几起几落。历史表明，什么时候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发扬艺术民主，文艺事业就生机勃勃，繁荣发展；什么时候背离了“双百”方针，搞“一言堂”，文艺事业就沉闷停滞，落后倒退。这是文艺和科学发展的一条客观规律。

正确处理文艺和生活的关系，坚持与发展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提倡创作方法的多样化。文艺和生活的关系是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生活是文学艺术的源泉。作家必须深入生活，从生活实际出发，真实地描写和评价生活。表现在创作上，就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问题。建国以来，在现实主义这个问题上，由于“左”倾文学思潮的干扰，也曾多次出现曲折和反复。矛盾的焦点集中在真实性和思想性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真实性和思想性是对立统一的。真实性是基础，思想性是通过真实性体现出来的。如果失去了真实性，也就无所谓思想性。在两者的关系上，常常出现误解、混淆以致颠倒的现象。粉碎“四人帮”以来，对真实性和思想性关系的理解更准确，文学恢复了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大量的优秀现实主义作品。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仍然应该而且必须坚持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前提下，也提倡创作方法的多样化。因为这对丰富与发展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方面的审美需求，对促进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都是颇有裨益的。

正确处理继承、借鉴和革新方面的关系，全面贯彻“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当代文学的发展有其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有自己的民族特点，同时它又是一种不同于任何时代的崭新的社会主义文学。因此，它需要继承、借鉴，更需革新。当代文学在继承、借鉴和革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教训也

是深刻的。1957年以后，由于“左”倾文学思潮的干扰，强调政治批判，忽视或阻碍对继承和革新问题的深入探讨。林彪、“四人帮”更把中外文学优秀遗产统统诬蔑为“封资修黑货”，标榜自己创造文艺的“新纪元”。8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轻视文学民族传统，过份崇拜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现象。正反面经验证明，对待继承和革新关系问题，必须全面贯彻“推陈出新”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为了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必须继承和弘扬我国民族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古代文学遗产，同时，也要借鉴外国的优秀文学遗产。首先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对文学遗产加以鉴别，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反之，全盘否定，拒绝继承，或全盘肯定，盲目崇拜，都是错误的。其次，继承和借鉴都必须加以革新、融化和创造，进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

我们伟大祖国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渴望文学艺术有个大的发展和突破，以满足他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只要作家和艺术家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文艺路线和方针政策，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深入现实生活，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勇于探索和创新，就一定能攀登世界进步文学的高峰，迎来一个光辉灿烂的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更加繁荣的新时代。

目 录

绪 论

第一章 “放歌文学” 1

第一节 “放歌文学”的宏观审视 1

第二节 李乔的《欢笑的金沙江》 4

第三节 闻捷的《天山牧歌》 7

第四节 郭小川的抒情诗 12

第五节 贺敬之的《放歌集》 16

第六节 杨朔的《雪浪花》等散文 21

第七节 秦牧的《花城》等散文 26

第八节 刘白羽的《日出》等散文 32

第二章 “一化三改”文学 37

第一节 “一化三改”文学的宏观审视 37

第二节 艾芜的《百炼成钢》 41

第三节 柳青的《创业史》 44

第四节 马烽、西戎的小说 54

第五节 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 57

第三章 革命战争文学 64

第一节 革命战争文学的宏观审视 64

第二节	峻青的《黎明的河边》	68
第三节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	73
第四节	吴强的《红日》和曲波的《林海雪原》	81
第五节	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	89

第四章 革命历史文学 94

第一节	革命历史文学的宏观审视	94
第二节	梁斌的《红旗谱》	97
第三节	杨沫的《青春之歌》	104
第四节	欧阳山的《三家巷》	109
第五节	孙犁的《风云初记》	114
第六节	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	119

第五章 “干预生活”文学 125

第一节	“干预生活”文学的宏观审视	125
第二节	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128
第三节	秦兆阳的《沉默》	131
第四节	流沙河的《草木篇》	134
第五节	马南 的《燕山夜话》	136
第六节	海默的《洞箫横吹》	140

第六章 “人性、人道主义”文学 144

第一节	“人性、人道主义”文学的宏观审视	144
第二节	宗璞的《红豆》、邓友梅的《在悬崖上》 方纪的《来访者》	147
第三节	徐怀中的《无情的情人》	151

第四节	《早春二月》和《兵临城下》	155
第七章	“以古鉴今”文学	162
第一节	“以古鉴今”文学的宏观审视	162
第二节	陈翔鹤、黄秋耘的小说	164
第三节	姚雪垠的《李自成》(一、二卷)	169
第四节	郭沫若建国后的历史剧	178
第五节	田汉的《关汉卿》	182
第六节	昆曲《十五贯》	190
第八章	台湾“浪子悲歌”文学	196
第一节	“浪子悲歌”文学的宏观审视	196
第二节	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	200
第三节	张系国的小说	205
第四节	白先勇的“台北人系列”小说	209
第五节	聂华苓的《桑青与桃红》	214
第九章	台湾“现代派”文学	220
第一节	台湾“现代派”文学的宏观审视	220
第二节	欧阳子的小说	227
第三节	王文兴的《家变》	230
第四节	七等生的小说	233
第五节	“现代派”诗歌	237
第十章	台湾乡土文学	243
第一节	台湾乡土文学的宏观审视	243

第二节	王拓的小说	247
第三节	陈映真的小说	251
第四节	黄春明的小说	255
第五节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260
第十一章	“忆悼文学”	265
第一节	“忆悼文学”的宏观审视	265
第二节	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	266
第四节	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	269
第三节	何为的《临江楼记》	273
第五节	白桦的《曙光》	276
第六节	丁一三的《陈毅出山》	279
第十二章	“伤痕文学”	284
第一节	“伤痕文学”的宏观审视	284
第二节	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	286
第三节	冯骥才的《啊！》	292
第四节	莫应丰的《将军吟》	295
第五节	宗福先的《于无声处》	299
第十三章	“反思文学”	304
第一节	“反思文学”的宏观审视	304
第二节	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	306
第三节	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	310
第四节	张贤亮的“唯物论者的启示录”	313
第五节	艾青的《归来的歌》	318